

关于中国家庭户变化的探讨与分析^{*}

郭志刚

【摘要】 文章对家庭研究基本概念进行了梳理,指出家庭户的演化是立户模式与家庭代际人口结构的互动过程,并就此推论中国流行的主干家庭模式在未来会促发老年“空巢”家庭。研究发现,人口因素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影响近年来不断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影响正在增强。生活在“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增长迅速,表明家庭分化水平正在提高。近年城乡隔代户人口比例增加显著,农村的情况尤其突出,反映了农村大量住户只剩老人与少儿留守的情况。此外,文章对不同阶段的人口流动对家庭分化与聚合的影响也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 人口结构 家庭模式 家庭类型 “空巢”家庭 留守家庭

【作者】 郭志刚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教授。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视角

由于中国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出生量的减少正在不断改变人口年龄结构,使之处于迅速的人口老龄化之中,它会逐渐加重老年人口负担。这是社会和政府都已经关注到的一个宏观人口趋势。这种宏观人口趋势同时还对微观家庭户的结构产生着巨大影响,它实际上反映在家庭户内部各代人口数量方面发生了相对变化,导致了家庭代际结构关系的变化。与此同时,近年来人口迁移流动大潮加速家庭分化,显著地改变着当前家庭户的规模和类型结构。中国政府目前大力倡导居家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的养老模式,以应对人口老龄化。但正如姚远(2008)的评价,这方面的工作研究比较多,而有关居家养老方式的研究不足,理论研究不足。笔者认为,这种不足其实关系到当前整体家庭研究方面的不足。

人口与家庭研究不仅需要通过实际调查统计数据来定量描述现实中的这种变化,而且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相应理论和模型方面的深入探讨,使得我们能够正确理解家庭规模与类型结构变化的含义及其未来的趋势。近年国内有关家庭变革的很多文献大多是按家庭社会学(潘允康,1994、2002;杨善华、沈崇麟,2000)、微观家庭经济学方式的研究(田雪原、胡伟略,1997),主要探讨社会和经济变革对家庭观念、家庭关系及家庭规模结构的影响;社会经济变化对子女养育成本和生育意愿的影响。本文则将人口因素作为有关家庭变迁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根据家庭人口学框架来进行研究。这种家庭研究框架将人口总量及结构作为家庭户生成和演化的基础。

* 本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家庭代际关系的人口社会学研究”(批准号:05JJD840002)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老年人口家庭、健康与照料需求成本研究”(批准号:70533010)部分资助。

家庭人口学范式一方面接受家庭社会学关于人们如何依据社会条件、家庭观念与血缘婚姻关系组成家庭户生活并维系家庭关系的所有理论,另一方面关注宏观人口如何通过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家庭户中代际人口结构推动或制约着家庭的分化或聚合,且通过人口统计手段来测量和分析家庭分化的程度。家庭人口学不能满足于一般的定性分析,因而试图提高定量化和模型化程度。因此,它要求各种概念更加明确,追求概念向变量的操作化、且通过变量的测量和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来检验有关理论,以便最终从定量描述和分析转向预测。

二、人口结构、立户模式与家庭户的演化

家庭人口学框架中,宏观人口变化是影响家庭代际结构与代际关系的原因的基础,因为家庭户结构与代际关系不仅受宏观人口结构的影响,而且还受家庭成员及各类亲属如何组成其生活的家庭户。这种组成方式就是家庭户的立户模式,由不同立户模式而产生出种种不同的家庭户类别,如社会学中所区分的多代联合家庭、主干家庭、核心家庭等。作为家庭分化最概要的指标,就是由总人口及其分化出的总户数所决定的平均家庭户规模。应当指出,以往家庭研究在概念上存在着将家庭分化立户模式简单等同于家庭户类别的简单化倾向。实际上家庭分化立户模式是决定着家庭生成、分化和衰亡过程的原则,而不同类别的家庭户则是体现分化立户模式的家庭演化结果。换句话说,即使是在同样代际人口结构的条件下,立户模式决定了人口如何组织他们的家庭户,不同的立户模式会导致社会有不同的家庭户类别结构。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一种立户模式又绝不意味着只产生一种与此对应的家庭户类别,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家庭户研究尤其重要,因为中国传统盛行多代联合家庭与主干家庭模式^①,这两种家庭模式都比较复杂。如果仅从简单的核心家庭模式只产生出核心家庭类别来看,模式与结果完全对应的,但从复杂家庭模式来看则不是这样简单。具体而言,核心家庭模式会导致彻底的家庭分化,因此它只产生出核心家庭,在户居方面割裂了除配偶外的所有成年人口之间的家庭关系。

然而,主干家庭模式在老代子女数量很多的条件下,一方面老一代要将一个成年子女及其配偶留在身边形成主干家庭,另一方面主干家庭立户模式还会将其他成年子女排斥出这个主干家庭户,另立分支核心家庭。因此,老代生育得越多、存活子女越多,那么社会中的分支核心家庭也会越多。并且可以推论,如果主干家庭模式不变,那么分支核心家庭未来又会发展成新的主干家庭。这其实就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和家庭的实际历程。不过,以前相当一些家庭社会学研究中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而简单地将核心家庭或二代户比例的扩大直接视为核心家庭模式正在被全社会广为接受的证据。这是不对的,其一是混淆了家庭户类别比例变化与家庭模式变化是两个不同概念,其二是这种混淆进而导致对中国家庭模式核心化的程度和速度有所夸大。

近30年来的人口转变过程已经大大改观了人口结构,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新的人口条件下主干家庭模式的分化结果有什么新特点。当接受计划生育的一代人进入老年后,由于其子女很少,如果仍按主干家庭模式来分化立户,则会导致没有其他子女可排斥,于是子代就很少再产生出分支核心家庭。并且,当子代有两个独生子女结合时,主干家庭模式的排斥力现在已经不反映在子代上,而是反映在小夫妻双方的两对老代夫妇之间了,这意味着只能有一方老年

^① 许多研究表明,尽管历史文学中更突出的是多代联合家庭模式,但实际上这种模式只是局限于少数的达官贵人阶层,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所能实行的家庭模式。

父母可以与子代生活于同一主干家庭,而另一方老年父母会(自愿或不自愿地)成为“空巢”家庭。可想而知,这种情况在生育政策更严、生育水平更低的城镇地区更为突出。

以上这些分析区分了家庭户类别与家庭分化模式这两个概念,并且还表明各种类型家庭户比例的变化不仅是家庭分化模式的结果,而且还是社会中不同家庭分化模式与家庭代际人口结构之间互动过程的结果。这种新的理论认识应当作为指南,才能使我们正确理解中国家庭户统计水平和变化的内在意义,更好地把握家庭户的变化趋势。

笔者以前在自己的家庭户研究中曾经认为,在正常情况下(即不考虑无子女或子代死亡)老年“空巢”家庭只源于核心家庭模式,所以其比例或生活于其中的人口比例的增加可以用来监测核心家庭模式的普及化。现在来看,这种认识是不严密的,充其量只能在老代高生育的代际人口条件下应用,但是已经不能适应新的代际人口条件下的家庭户分析。也就是说,我们正在经历低生育的一代进入老年阶段,并且处于迅速发展的格局,所以主干家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会促发更多的老年空巢家庭。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什么更好的指标来定量地监测社会家庭模式的变化成了家庭户研究的新问题。

至于近年来人们常提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如果从上述概念框架来看,其实它既不是在指一种家庭户类别,也不是在指一种家庭户分化模式,而是在指一种微观上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试想,如果这三代的7个人真的在一户生活,那么按定义这将是一个多代的联合家庭户,而实际上这种可能性极小。当然,它更没有规定这三代中的7个人如何分化和组成家庭户,这种家庭代际人口结构既可以按核心家庭模式分化为两个老年“空巢”户和一个抚养子女的二代核心家庭户,也可以按主干家庭模式分化为一个三代主干家庭户和一个老年“空巢”户,当然也可以形成一个多代联合家庭户。因此,“四二一”家庭结构的提法其实仅仅是在指一种微观上日益增多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条件,指向这种情况可能产生的各种家庭关系方面的变化,但是并没有具体涉及家庭户分化模式和家庭户类别结果的问题。

综上所述,将代际人口结构、家庭户类别结构与家庭分化立户模式从概念上区分开的分析思路,有助于家庭变化理论的发展,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实际观测的家庭户类别构成的变化,有助于对其变化原因的进一步探究,还有助于结合未来人口变化趋势来分析家庭户变化趋势。

人口结构和家庭模式的互动变化导致了家庭类型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相当一部分传统家庭养老支持功能。本文将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提供的信息着重分析微观家庭户居角度反映出来的变化,并尝试剖析有关变化的原因,并对可能的变化趋势加以讨论。

三、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变化

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历年人口变动调查都提供了总人口及其人口年龄结构,同时还提供了总户数的信息。从1982年人口普查以后,关于户居又区别了家庭户和集体户两类情况。总的来看,由于家庭户户数和人口占总户数及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即使采用笼统的户资料也可以大体反映家庭户方面的变化,如果直接应用家庭户的数据来研究当代家庭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则更有效。根据中国拥有的十分完整的公安年报户籍统计的全国的人口数和户数统计,便可以计算出各个年份的平均户规模。

图1描绘了全国平均户规模的变化动态,同时提供了相应年份的出生率。1982年以前的数据是根据公布的公安户籍统计资料中的人口数和户数计算得到,未区别家庭户和集体户,只能大体反映家庭户规模的变化。1982年、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不仅提供了家庭户

和集体户的人口数和户数,还提供了家庭户的平均户规模。1987年、1995年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也提供了有关家庭户的详细统计数字。此外,国家统计局在其他年份所进行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又补齐了其他年份的平均家庭户规模。这些来源的(家庭)户信息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的大趋势,尤其是能够很好地反映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家庭户变迁。

从图1可以看出,中国家庭户规模的大趋势实际是由出生率水平决定的。在新中国建立后的前14年里,家庭户规模由于出生水平很高(其实还受死亡率迅速下降影响)处于扩张过程。其间,由于1960年前后的天灾人祸,使得这种趋势受到了短期的干扰,变得不太明显。在图1中的两条曲线上各自加上“天灾人祸未发生”的假设虚线后,便可以更容易地看出家庭户规模变化趋势其实是与出生率由35‰以上的高水平下降到25‰时发生了逆转,从1974年开始下降,并伴随低水平的出生率一直在缩小。而平均家庭户规模在20世纪90年代下降速度比80年代要显得较为缓和,但在90年代后期到2005年又出现了阶梯式骤降。尤其是,2000年以后出生率已经很低而下降势头趋缓,但同期家庭户规模下降的斜率却变得更陡。从这样的曲线对应关系上可以推测,近几年,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原因更为复杂,除低出生率(或更准确地说是人口中的少儿比例减少)的原因外,还存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因素。

1980年以来,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1990年后社会经济发展更加迅速,我们有理由认为家庭户规模变小除人口原因外,社会经济变化也在改变家庭分化立户模式,从另一个侧面加速家庭分化的进程。因此需要专门对家庭户规模缩小的因素做进一步分解,并对上述猜测加以验证。

四、从人口普查数据看户均人口结构的变化

使用几次全国人口普查及1%人口抽样调查提供的总人口年龄结构比例套用在平均家庭户规模上来做一种不太严格的匡算^①,便可以分解出家庭户平均规模变化中由于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比例(见表1)。从表1上部所提供的各年人口年龄结构看,1982~2005年间少儿比例从1/3强下降到不足1/5,表明1982年以来户规模不断缩小的确与少儿人口比例不断缩小相对应。少儿人口比例之所以会影响到平均户规模,是因为少儿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必须由父母或其他成年亲属来抚养。因此子女越多家庭户规模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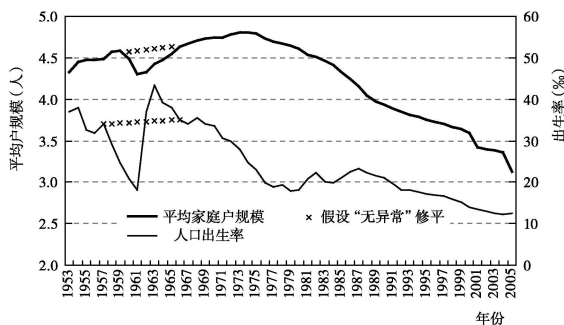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与出生率的变化

注:1954~1994年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95)》;1995年及以后各年总人口和总户数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所有数字均为公安年报户籍人口统计数);2001~2005年家庭户平均规模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6)》;1999年及以前的出生率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2000~2005年出生率为国家统计局人口变动调查结果,转引自《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6)》。

① 如果使用家庭户人口的年龄结构则更为恰当。

表1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与平均每个家庭户内人口结构的变化

	1982年	1990年	2000年	2005年	差额比较			
					1982~1990年	1990~2000年	2000~2005年	
年龄结构比例(%)					户规模缩减量(人)	0.45	0.52	0.31
0~14岁	33.59	27.69	22.89	19.55	户少儿人数缩减量(人)	0.38	0.31	0.18
15~64岁	61.50	66.74	70.15	71.37	户少儿人数缩减的影响比例(%)	85.5	59.4	56.6
65岁及以上	4.91	5.57	6.96	9.08				
平均家庭户规模(人)	4.41	3.96	3.44	3.13				
0~14岁	1.48	1.10	0.79	0.61				
15~64岁	2.71	2.64	2.41	2.23				
65岁及以上	0.22	0.22	0.24	0.28				

注: 历次普查的人口年龄结构和家庭户规模数据引自《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

用各年的平均家庭户规模直接乘以相应年份的年龄结构比例,便得到了平均每户中的少儿人数、青壮年人数和老年人数。这实际上是根据总人口的年龄结构比例将平均每户人数进行了相应的年龄分解。于是,我们就能看到平均每户中不同年龄段人数的变化,并且可以进一步揭示出平均户规模变化中的不同成分。比如,1982~1990年家庭户规模下降了0.45人,而同期每户少儿人数下降了0.38人,所以,每户少儿人数的减少量占了平均户规模减少量的85.5%。可见,该时期中户规模缩小虽然有其他原因(可解释另外15%),但主要是由于少儿人口数的减少。在1990~2000年间,平均家庭户规模又继续缩小了0.52人(略大于20世纪80年代的相应水平),而每户少儿人数的减少量为0.31人,仅占平均户规模减少量的59.4%,说明出于其他原因的户规模缩小量有了明显增大,但少儿人数的减小仍是主要原因。2000~2005年,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了0.31人,少儿人数缩减的影响比例则又减少为56.6%。可见人口因素虽然仍是家庭户规模缩小的主要原因,但其影响作用正在逐渐衰减。

总的来说,相比户平均规模和户均少儿人数的变化幅度,户均青壮年人数和老年人数的相对变化较小。因为与少儿人口不同,这两部分人口都具有自立成户的能力,其人口数量总是较密切地与户数保持着一定的数量关系(即户主率)。这种数量关系发生变化时,则意味着分家立户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因为青壮年和老年都具有自立成户的能力,这里的平均每户中的青壮年人数与老年人数只能反映了家庭代际人口结构变化的一般特征,并不能具体反映在近年的家庭户数剧增^①中青壮年人口和老年人口各自到底起什么样的作用。通常可以采用年龄别户主率方法来对此加以具体分析,但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样本中有相当一部分家庭户中没有户主^②,只好采用另一种方法,即通过各年龄人口在不同类型家庭户中生活的分布比例来对此进行分析。

五、不同年龄人口在各种家庭户类型中的分布情况

以往家庭研究从理论和统计上已经证明,中国当代的家庭模式正在从主干家庭模式向核

① 总人口还在增长,而平均家庭户规模下降这么快就意味着家庭户数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② 这种情况显然是与此次调查同时调查户籍人口与现有人口,然后又将其中的非常住人口从提供的数据样本(相当总人口的2%)中删除有关。

心家庭模式转变。图 2 提供了 1990 和 2000 年时年龄别的家庭户人口的户居类型分布, 还提供了 2005 年的最新变化^①。3 个子图虽然反映出一些变化, 但大体情况稳定, 仍然能够肯定上述这种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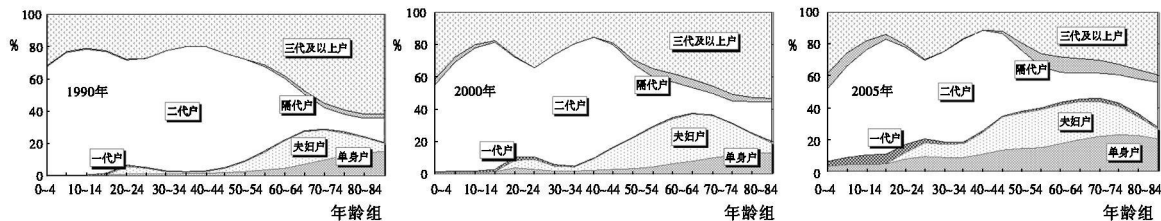


图 2 家庭户人口按户类型的年龄分布比例变化

这种图形以各年龄组总人口作为 100%, 计算出各种类型户人口在该年龄组中所占的比例。这种统计处理有助于排除由于各年龄人口绝对数差别太大而造成的分析困难, 有助于表达各种户居类型对不同年龄人口的相对重要性, 同时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家庭生命周期特征。

首先, 生活在单身户中的人口比例是随年龄提高而增加的。2000 年比 1990 年时这一比例在 20~24 岁组有所提高, 但在高龄段却有所下降; 然而, 2005 年这一比例则发生全面而显著的增加, 并且高龄段中下降的特征也表现得更为明显了。

一对夫妇户人口比例表现出马鞍形特征。先在人们结婚至初育间暂时显现, 且比例很小。年轻段的夫妇户是离开父母单独立户且尚未生育的夫妇, 中国夫妇从结婚至生育的时间一般较短, 因生育子女而很快转变为二代户。随着成年子女最后全部离开, 进入老年后夫妇户人口比例又再度提高。老年夫妇户成为“空巢”家庭, 我们看到其变化趋势是达到 20% 以上比例的年龄越来越提前, 并且维持时间越来越长^②。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显然是由于生育少、间隔短、夫妇存活水平提高等这样一些人口因素变化的主要影响, 而在家庭模式方面则反映出社会中核心家庭模式的影响力增大, 同时如前所述, 这种变化中也可能存在以前比较少见的主干家庭模式在当前的新现象, 即可能有许多独生子女夫妇在随某一方父母共同生活的同时又必须排斥另一方父母。但最后随着夫妇年龄提高, 丧偶概率日益增大, 所以夫妇户人口比例越来越小。存活的孤寡老人有可能单身生活, 也有可能投奔子女或其他亲属(或转入机构养老)。

过去一些家庭研究文献中经常将二代户比例的提高作为核心家庭(模式)化的证据^③。本文前面已经从理论上说明主干家庭模式在特定人口状态下也会产生大量核心家庭, 并且这里的图示又进一步揭示出二代户不仅有抚育子女的功能, 而且也有赡养老人的功能。可以看出, 老年人口中仍有相当比例的老人生活于二代户中, 我们还发现较老的老年人在二代户中生活的比例其实还有显著的提高趋势^④。这使我们猜想中国的家庭分化的实际情况要比现有理论家庭模式更复杂, 很有可能很多夫妇在刚进入老年时不与成年或已婚子女生活, 然而到较老年

① 根据 2005 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样本汇总。需要注明, 本次小普查正式公布的平均家庭户规模为 3.13 人, 但该样本统计值仅为 2.52 人, 这种差异也与上述将非常住人口从分析数据样本中删除有关。

② 1990 年时只有 65~69 岁 1 个年龄组, 2000 年时有 55~74 岁的 4 个年龄组, 2005 年时有 45~74 岁的 6 个年龄组。

③ 核心家庭的严格定义应该是夫妇加未成年或未婚子女。上述这种情况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对子女的条件限制。

④ 8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二代户中的比例, 1990、2000 和 2005 年时分别为 14.99%、24.48% 和 28.58%。

阶段时由于各方面状况不太好或丧偶,又重新“回归”与后代一起生活,而这时他们的子女大约处于壮年和“年轻老年”阶段,而年轻的孙子孙女们都分出去另立家庭了。3个子图表现出的较老年年龄组的二代户比例明显提高便是这种特征的一种反映。

生活于隔代户中老年人从另一角度反映出一种新型代际家庭。我们看到,在1990年时这种情况很少,但在2000年有所增加,特别到2005年时这一比例有了更为明显的增加。这种情况显然主要不是因为子代死亡造成的,隔代户中的老年人实际上是在替不在本户的成年子女抚养幼年的孙辈。形成老人隔代抚育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1)原本三代户中的子代外出流动迁移、剩下老人与孙代在原户留守(主要发生于农村);(2)为了孙代能就近上个好学校(主要发生于城市);(3)老年人为了取得代际精神慰藉。

三代及以上户代表了传统的多代共同居住的家庭模式,体现了丰富的代际关系。需要指出,三代及以上户在少儿和青壮年阶段的人口比例虽然低于二代户,居于第二位,但其在老年阶段时却一直处于第一位,可见其在家庭养老方面的重要地位。从3个年份之间的比较来看,三代户人口比例处于显著减少的发展趋势中。

下面再来比较2005年按现居住地划分的市镇与县的不同家庭户居类型中的人口比例(见图3)。由于大量的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按居住地划分市镇人口其实反映的是原来城镇人口和流入的农业户籍人口,而县人口则反映的是现在仍然留在农村的农业户籍人口。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市镇15~44岁中青年人口在单身户和夫妇户中的比例比县的相应水平明显高得多,其原因一是因为城镇年轻人口较早脱离父母另成一户,二是由于近年来大量农村中青年人口进入城市的流动使他们离开了留守在家乡的老年父母。与此对应,县老年人口处于单身户与夫妇户中的比例已经接近于城镇的水平,尽管如此,县老年人口其处于三代及以上户中的比例还是显著高于市镇情况,并且在高龄段时尤其如此。

比较市镇与县的情况时,还能看到另外几个很有意思的情况。首先,县人口中生活在隔代户中的比例无论是在少儿部分还是在老年部分都显著大于市镇的相应水平。因此,这反映出因中间一代流向城镇后农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子女的一种情况。其次,还可以看出一代户上的明显差别。一代户是由不同代际的非直系亲属及非亲属或同一代中兄弟姐妹所形成的住户。市镇一代户人口比例在青年段明显大于县,反映出这段年龄人口因工作学习和迁移流动而单独立户的状况。而县的一代户人口比例却主要是表现在少儿人口中,并且这一比例显著大于市镇相应水平,由此可见他们主要是农村由其他亲属代管的留守儿童。

上述这些现象反映出近年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对城乡家庭结构的巨大影响,它一方面加速了农村家庭户的分化,另一方面又对流入地城镇的住户结构产生影响。这种情况很值得我们对其发展前景多做一些探讨。由于实际中可观察到流入人口以完整家庭形式在城镇生活,

因此有一种说法是人口流动存在着家庭化趋势。这种观察看到的是个结果,如果细分这个结果是怎么形成的,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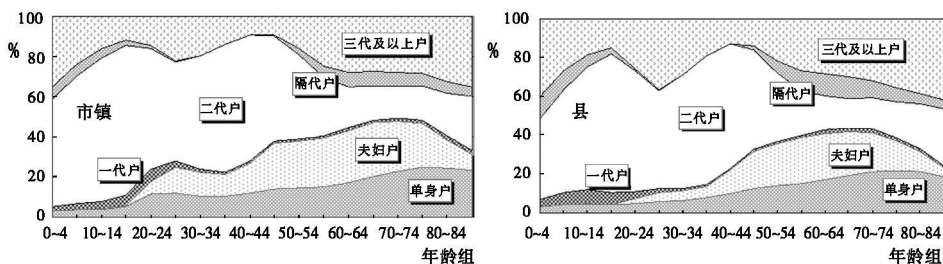


图3 2005年市镇与县的家庭户类型人口比例的比较

么人口流动家庭化应该有两种形式(郭志刚, 2004)。第一种形式是分步完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 即原家庭第一波流动是社会经济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 然而一旦在城镇站住脚, 就会陆续将配偶、子女甚至老年父母接过来, 于是又形成第二波流动的影响。因此, 前一波导致原家庭户的分化, 后一波导致原家庭户在新的居住地重新聚合。第二种形式是因为后来的流动人口有以前的亲属、老乡的接应和安排, 夫妇同时流动的可能性会有所提高, 甚至是携子女和父母同时流动。那么第二种形式所表现出来对原来家庭户的分化作用就小得多, 并且其第二波家庭聚合流动的特征也就弱得多。总之, 我们对人口流动的这些方面研究得还不够, 未来人口流动对家庭户分化和聚合的影响还存在一定变数, 这种发展过程将会受社会中不同家庭分化立户模式消长和原来家庭中代际关系紧密度的影响。

六、老年人口与子女共同居住的现状

养老是家庭的重要传统功能之一。将老年人口中在单身户生活的比例与在夫妇二人户生活的比例合计起来, 便可以大致反映有关老年人口中在“空巢”家庭生活(即子女不在身边)的流行程度^①。我们将老年人口中在二代户、隔代户和三代户的合计比例作为老年人与后代共同生活的比例(由于一代户对这一研究目的的意义不清楚, 两边的合计都没有包括一代户)。表2中提供了1982、1990、2000和2005年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中在“空巢”家庭户的比例和与后代共同生活的比例, 以比较不同时期的水平和变化趋势。

如前所述, 在老一代生育子女数很多的人口条件下, 不仅可以应用这种指标反映老年人居住状况, 而且可以应用这一指标大略反映核心家庭模式被整个社会接受的程度。但是, 由于随着大量独生子女之间结婚成家, 就是在主干家庭模式下也会产生对其中一边的排斥力, 使其中一对老年夫妇不得不成

表2 老年人口户居安排的比例变化 %

年份	在二代以上户的比例			在“空巢”家庭户的比例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1982	71.62	74.24	73.06	26.83	24.57	25.58
1990	69.45	75.01	72.49	29.78	24.44	26.86
2000	61.57	69.55	65.78	37.42	29.85	33.43
2005	53.88	59.51	56.73	44.09	38.89	41.46

注: 两种人口比例均不包括生活于一代加其他人的家庭户中的老年人。

为“空巢”家庭。因此这一指标将会随着老年人口的更替, 逐渐失去其测量社会中核心家庭模式接受度的能力。不过, 它仍然能够反映老年人是否与后代同住的现状。

从不同年份的对比来看, 无论以哪种口径, 与后代共同生活的老年人比例基本上都处于减少趋势, 而生活于“空巢”家庭户的老年人比例则处于上升趋势。并且, 变化呈现了加速的趋势。2000~2005年, 相应比例变化幅度甚至超过了前面10年的变化幅度。由于当前老年人的子女中独生子女的比例并不很大, 因此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统计结果认为, 核心家庭立户模式正在迅速扩大, 但至今传统多代家庭模式还占据着主要地位。

此外, 在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中, 与后代同住的比例尽管从1990年的79.38%下降到2005年的72.24%, 其所占比例仍然在各种户类型中占有绝对优势。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了高龄老人的年龄特征, 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其队列特征, 表明当前的高龄老人对于家庭养老的高度依赖。

^① 这里并没有控制老年人是否有子女的影响。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统计, 60~64岁组的老年妇女46300人中有1.5%没有存活子女, 有8.2%没有存活男孩。

七、小 结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出以下几方面的结论。第一,家庭户的演化是立户模式与家庭代际人口结构的互动过程。判断家庭户发展现状与前景时,要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分析。社会中同时存在多种立户模式,我们应当研究和监测其在家庭户演化中的地位。把握家庭模式变化程度对于理解当前状况和预计未来走向是十分重要的。第二,主干家庭模式在中国社会中占有主要地位,它是一种复杂的户分化模式,与代际人口结构的互动性更强,在不同的家庭代际人口结构条件下,它既能产生多代家庭户,也能产生年轻一代的分支核心家庭户,在未来的特定代际人口条件下甚至能够产生老年“空巢”家庭户。第三,计划生育推动了中国人口结构的巨大转变,是导致平均家庭户规模迅速缩小的主要原因。但由于生育水平已经在20世纪90年代降到很低,因而这种纯人口因素对家庭户规模影响近年来不断减弱,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迁移流动及生活方式变化使主干家庭模式和核心家庭模式发生此消彼长,家庭分化程度正在提高。第四,从老年人口角度,与后代一起居住的比例依然占据多数,尤其在高龄老人中还占70%以上。但处于“空巢”家庭的老年人口比例已越来越大,因此他们在家务和医疗方面的特殊服务需要应当加以重视。第五,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的最新人口数据揭示出城乡家庭户人口中处于隔代户的比例在近年增加十分显著。由于隔代户的孙代人口主要是少儿人口,因此这种隔代户体现的主要是隔代养育,而不是隔代养老。并且这种情况在县人口中反映更加突出,这是近年来大量农村青壮年人口的流入城镇导致许多农村住户中实际上只剩下了留守的老人与少儿,政府和社会都应当对此状况所可能引发的问题特别加以关注。第六,当前的人口迁移流动主要体现了对城乡家庭户分化的巨大影响,它一方面加速了农村家庭户的分化,另一方面又对流入地城镇的住户结构产生影响。同时,我们还应当关注它对家庭户的影响可能存在着阶段性,即在以后还有可能产生对家庭户的聚合影响。

参考文献:

1. 国家统计局:《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相应年份。
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85):《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3.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1993):《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4.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2):《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5.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2007):《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
6. 郭志刚(2004):《中国1990年代的家庭户变迁》,载于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编:《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科学讨论会论文集》(下册),中国统计出版社。
7. 路遇主编(2004):《新中国人口五十年》,中国人口出版社。
8. 潘允康(1994):《当代中国家庭大变动》,广东人民出版社。
9. 潘允康(2002):《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0. 田雪原、胡伟略(1997):《中国家庭经济与生育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11. 杨善华、沈崇麟(2000):《城乡家庭——市场经济与非农化文化背景下的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2. 姚远(2008):《从宏观角度认识中国政府对居家养老方式的选择》,《人口研究》,第2期。
13. 查瑞传、曾毅、郭志刚主编(1996):《中国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

(责任编辑:朱犁)

ABSTRACTS

Study on Changes of China Family Households in Recent Years

Guo Zhigang ° 2 °

This paper clarifies some concepts in family studies and attributed family change to interactions between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household formation patterns. The stem family patterns that steer family splitting may turn out more empty-nest families in near future. The analysis also shows that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change on the shrinkage of family size was weakening while the influence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enhancing. Moreov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eople living in empty-nest family h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dicating that the degree of family splitting was growing. In addition, the latest data show remarkable increase for pseudo-three-generation households now,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rea, reflecting quite large amount of old people and children left at home after the prime labors migrated into cities. The paper also briefly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population floating on family split and fusion.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Labor Supply in China's Cities

Ding Renchuan ° 11 °

Since China initiated its practice of market economy system, the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diminished quickly in cities.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ot causes of this phenomenon at macroscopic economic level, the paper makes use of time series data containing information on population, employment and macro economy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macroeconomic factors on temporal and lagged labor supply, by employing factor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vector auto-regression analysis. It conclude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transition of economic system, unemployment rate and increase of labor supply are main determinants of the reduction of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Regional Change in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Effects of Labor-land Ratio Off-farm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Labor Compensation

Lu Wencang Mei Yan Li Yuanlong ° 20 °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aper investigates the regional change and its causes in production of rice, wheat and corn since 1978 by using spatial error model and panel data of 1978-2006 from all Chinese province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exists an obvious regional correlation in Chinese grain production. A production increase in a province can induce an output decline in its neighbours. Besides natural and technical factors,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man-land relation, non-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nd labour payme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in China, which applies particularly to the production of rice and wheat. With growing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development, China's grain production will be transferred to and concentrated in economically less developed areas with relatively rich arable land per capita, few opportunities for non-farming employment and lower labour remuneration.

The Effects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Li Wenxing Xu Changsheng ° 29 °

Using time series data and cointegration regression method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investigates the effects of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a over the period of 1952-2004. The results show that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both in the long run and in the short run. These results also suggest that the decline in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may be an important factor leading to the decline in the ratio of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to real GDP in China in the long run, and the same is also true for the short run. Now that the decline in natural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approaching the bottom of its trend, it will only have a limited impact on real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s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Level, 1992 to 2006

Song Shiyun Li Chengling ° 38 °

Social security expenditure level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s to judge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Since 1992, following the growth of China's economy, the expenditure on the social security has also been growing steadily. However, compared with countries with social insurance patterns, China's social security level is low; compared with the need of domestic social security, the social security level is not appropriate. The limited social security supply cannot meet the growth of social security need. Un-